

语言为何没有灭绝：透明化与不透明化的永恒张力

原创 约翰老师 五宝爸约翰聊英语 2026年7月18日 11:36 新加坡



五宝爸约翰聊英语

持续输出英语家校共学翻转课堂全英全科K12体系，英语学习，AI知识创新的干货。

366篇原创内容

公众号

摘要： 语言为何没有像其他许多人类发明那样灭绝？本文拒绝将语言的存续能力归因于某个单一的静态本质（如递归运算能力、社会契约功能），而是将其重新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的持续运作。文章提出，语言的生命力不在某个功能的完善，而在两种根植于其媒介本性的、方向相反的运作模态之间永不停歇的撕扯：一种模态要求语言消隐自身，成为指涉世界的透明通道（“透明化”）；另一种模态要求语言凸显自身，成为被品味、被共振的不透明物质（“不透明化”）。这两种模态不是语言后来获得的两种“功能”，而是声音这一同一物理基质在进入符号运作后必然分化出的、不可通约的两个运作面相。文章沿此张力主线，重新梳理语言从声音游戏到符号系统再到文明载体的演化历程：语法被分析为两种模态相互塑形的战场，口头传统的跨代存续被解释为不透明化的封装力量在危机时刻对透明化的拯救，而每一次单极化的冲动（纯粹逻辑语言或纯粹声音游戏）都被论证为对语言呼吸孔的堵塞。最终，本文指出，一种语言的真正危机，不在于词汇萎缩或语法崩解，而在于这两种模态之间的角力是否还在有效运作。我们至今仍在说话，并非因为我们找到了完美的语言，而是因为我们至今仍在为如何让同一个声音既指涉世界、又共鸣彼此这两件无法调和的事而挣扎。

关键词： 语言存续；发生学；美学-认知张力；语法演化；口头传统；语言哲学

一、引言：重新提出语言存续的问题

如果说语言从来就不是为了把话说清楚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刻意的奇谈。毕竟，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用它进行精确的沟通、激烈的辩论、不动声色的欺骗和一丝不苟的契约签订。离开这个高效的符号系统，我们熟知的人类文明一刻也无法运转。然而，恰恰是这种日常经验的压迫性在场，制造了一个隐蔽的认知惯性：我们把语言在高度成熟的文明阶段所展现的某些特定功能，倒过来认作了它最原初的动机和唯一的存续理由。我们赞美一架精密机器的完美运作，却可能对它最初的构造逻辑——它为何以这种特定的方式被组装起来，又为何能在漫长的使用中不断自我维持——失去了追问的兴趣。

这并不是要否认语言作为认知工具的强大。而是要指出，当“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太过现成时，“语言为什么能活着”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就很容易在智识上被消解掉。毕竟，如果语言的价值仅仅在于其工具性的效用，那么可以推断：越精确、越高效、越能服务

于外部目标的语言系统，就应该越有生命力。但历史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个推断。许多在逻辑上高度完善的人工语言——从十七世纪那些企图用一个符号严格对应一个概念、毫无歧义的“通用哲学语言”，到当代诸种设计精巧的编程语言——如果离开特定的使用社群和制度性维持，便无法像自然语言那样在代际间自我传播。反过来看，许多在形态上看似“低效”、冗余、充满不规则形式的自然语言，却恰恰展现了惊人的韧性：它们能在被殖民、被禁止、被现代教育体系排斥的极端条件下，以歌谣、仪式、谚语、摇篮曲的形式蛰伏数个世纪，然后在某个时刻重新全面回归日常使用。一种关于语言存续的理论，如果不能同时解释逻辑语言的脆弱和自然语言的韧性，就很难被认为是充分的。

长期以来，关于语言起源和演化的研究，主流精力集中在认知机制的层面。语言被视为一种认知革命的结果：或者是大脑中负责递归运算的神经模块在某个演化节点上被突然点亮，或者是在自然选择压力下，高效信息交换能力带来的适应性优势被不断放大。这些研究深刻地揭示了语言作为一套计算系统的精妙结构。但它们对于语言中同样普遍、甚至更为古老的那些“非逻辑”现象，往往只能提供功能主义的边缘解释：为什么所有已知的人类语言都有诗歌和音乐？为什么不同文化中那些无人能解的仪式咒语，必须用某种特定的、不可更改的节奏来念诵？为什么儿童在掌握任何有指涉内容的单词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充满旋律感的咿呀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声音本身显然不是工具，而是某种被反复玩味的、自给自足的感性经验？



这些现象暗示着，在语言被指涉逻辑完全主宰并彻底工具化之前，有一个更古老、更底层的运作模态在持续地发挥作用，并且时至今日仍未退场。这个模态的特征是：声音不是被当作透明的载体来穿过，而是被当作一种有重量、有质感、有身体冲击力的物质来直接体验。这两种模态——一个要求声音消隐，以最大程度地让位于它所指向的外部世界；另一个要求声音凸显，以最大程度地让他人感知到它的物质在场——自语言进入符号运作的那一刻起，便已经咬合在一起，从此互不放过，也从未真正和解。本文将论证，语言的存续动力，并不在

于在这两种模态之间找到了某种最优的平衡点，而恰恰在于它们之间永不停歇的、不可能被彻底调和的内在纠缠。这道永远合不拢的缝，并不是语言的缺陷，而是它的呼吸孔。

这个判断需要被清晰地安放在当代语言研究的坐标系中，而不是在真空中悬浮。近二十余年来，以莫滕·克里斯蒂安森和尼克·查特等人代表的“语言作为文化适应”理论，已经有力地论证了：语言的现有形态并非纯粹先验逻辑的产物，而是在代际学习和使用的反复迭代中，被人类普遍的认知、记忆、处理瓶颈等约束条件所“塑造”而成的。语法结构的许多特征，之所以在不同语言中呈现出某些统计上的普遍倾向，恰恰不是因为它们是最“完美的”，而是因为它们最容易被人类尚未成熟的大脑所习得、最容易被有限的工作记忆所处理。这套理论成功地动摇了语言作为纯粹先天认知模块的传统图景，将语言放回了社会传播和文化演化的动态场域中。

然而，在“可学习性”、“可处理性”等认知瓶颈之外，是否还有另一类同样强大、但运作方向完全不同的约束力量在塑造语言？本文的论点正是：除了要让语言变得更容易被大脑处理（可处理性压力）之外，还有一种同样不可还原的压力在持续地作用——它要求语言变得“不透明”，即凸显自身的物质性和形式质感，从而能被嘴巴和耳朵所品味、被身体所共振、被群体所共享。这种压力不是认知瓶颈的副产品，也不是帮助记忆的辅助手段，而是一种根植于人类存在状态的独立需求：我们不仅需要通过语言来传递关于世界的命题，还需要通过语言来确认“我们正在共同在场”这一事实本身。克里斯蒂安森和查特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语法结构容易被淘汰，本文的理论则试图解释：为什么即使某些结构在认知上并非最优，它们仍可能被顽强地保留下来——因为它们同时满足了“不透明化”的压力，它们在让语言“难用”的同时，也让语言“可唱”、“可记”、“可在身体上被触动”。两种压力共同作用，才是塑造自然语言从未退场的完整故事。

在展开论证之前，为主张留下可修正的后门是必要的。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语言学家或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其语言系统在长期的日常使用中，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基于对声音本身的物质性玩味而自发产生的形式偏好——没有隐喻的凝固与更新、没有对特定节奏模式的集体倚重、没有任何无法被信息效率量化的修辞操作，并且其使用者对这套纯粹工具性的语言系统感到完全满意、从未产生任何偏离其工具用途的冲动——那么，本文从“这两种模态的永恒张力”来解释语言存续动力的整个框架，就需要被从根本上修正或摒弃。

以下，本文将分五步展开论证。首先，回到语言的发生现场，分析声音游戏作为两种模态尚未分化的原始母质，如何孕育了后来将被撕扯开的双重力（第二节）。其次，分析符号指涉的发生，如何将同一声音基质强行劈裂为“透明”与“不透明”两个不可通约的运作方向，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系统性的内部紧张（第三节）。第三，以语法为分析焦点，将它重新定位为这两种模态相互塑造、相互妥协的战场，而不是纯粹逻辑冲动的结晶（第四节）。第四，通过口头传统在文明断裂带的跨代存续这一关键现象，论证“不透明化”力量在危急时刻的封装与救援作用（第五节）。最后，回到核心判断本身，论证语言的存续动力不在于回归某个原初的统一状态，而在于永不停歇地处理这场无法取消的内在张力（结论）。



二、声音的游戏：裂痕尚未出现之前

现在让我们回到语言发生的现场。不是以考古学的方式挖掘化石，而是以现象学的方式去看：在那个指涉世界的功能介入之前，声音本身在做什么？

来自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观察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入口。任何一个正常发展的婴幼儿，在发出第一个可以被辨识为“指涉某物的单词”之前，都要经历一个长达数月的、被称为“咿呀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会自发地发出大量并非母语独有、也无意指涉任何外部对象的音素序列——她不断重复“ma-ma-ma”、“ba-ba-ba”、“da-da-da”，进行变调、拉长、截断、重新组合。这些声音游戏不是被教的，也不是为了实现某个外在于游戏本身的实用目的。她显然不是在练习将来需要使用的音位系统——那意味着她已经知道了一个预设的目标。更准确的现象学描述是：她发现了自己的发声器官是一个可以自行操控、且能产生回响的内在玩具。这个玩具不会损坏、不需要电池，但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属性：它能触发周围成人的一系列有趣的回应——微笑、模仿、身体的晃动、以及整个被抱起来的温暖感。这个由声音触发的社交回响，比任何糖果都更能维持她继续玩下去的动力。一个基于声音快感的正反馈循环由此建立。

请注意这件事的性质：在“意义”出现之前，声音本身已经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媒介。它有高低、快慢、强弱、音色，它能以不可见的方式，在两个人的身体之间制造出一段虽转瞬即逝、却又实实在在同频的生理共振。当一个成人模仿婴儿的一个咿呀声，而婴儿又反过来模仿这个模仿时，这场来来回回的“对话”可能持续好几分钟。在此期间，双方完全没有交换任何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信息——没有关于牛奶、玩具或危险物的指涉——但他们得到了一种东西：那种被称作“互为主体性”的、我们在一起共享着同一个当下经验的深层满足。

罗宾·邓巴的“社交梳毛”假说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的演化框架。邓巴指出，当早期人属的群体规模扩大到超出物理梳毛能有效维系的阈值后，声音很可能作为一种更高效的“集体梳毛”替代品被演化选中。但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声音更高效”这个层面上，我们

就仍然停留在一个功能主义的解释里。更值得追问的是：梳毛本身究竟在“传递”什么信息？答案可能是：几乎没有可以被编码、被复述为命题的“信息”。梳毛传递的是一种被他者触碰的直接感觉：我在这里，你也在这里，我们是安全的，我们是靠近的，我们是“我们的”。这种感觉不需要任何概念的中介，不需要任何逻辑的推理，它的发生本身即是其全部意义的实现。

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不透明化”模态的原型。在这个模态下，声音不是用来穿过以抵达某个别的东西的，而是用来被停留在其本身的。一段无词的旋律、一串有节奏的呼号、一声婴儿不明所以的咿呀——这些声音事件让在场者的注意力不是被引向外部，而是被聚集在声音事件本身及其所创造的身体-情感共振场上。在许多原初文化的仪式中，声音的精确性被供奉得比语义的精确性更为紧要：某个音调的错误，比念错一个名字更被视为对神圣秩序的冒犯。这深刻地暗示着，在语言根系最深的那个层面，一度有一种对声音本身的物质完整性的严苛要求——话语首先必须是被可重复的、有节律的、能直接撼动人心的。缺少这些品质，仅凭干枯的指涉关系，是无法撑起一场需要让所有人都愿意持续在场、反复从事的集体活动的。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原初统一体”的诗意描述上，我们就犯了发生学最应警惕的错误——将某个想象中的“起源时刻”浪漫化为一个后来所有分裂都应当为之哀悼的“黄金时代”。事实上，前指涉的声音游戏并不是“真”与“美”尚未分裂的理想状态。更准确的说法是：它根本还没有进入真假判断的维度，也因此谈不上“美”——它只是一片尚未被任何规则耕犁过的原野。在那个阶段，不存在两种力量的撕扯，因为其中一方还完全没有登场。

但这片原野已经悄悄准备好了未来将撕扯开的两种可能性的胚胎，它们都埋藏在同一个物质现象之中：声音的“共享性”。一方面，正是由于声音能被共享、能被双方同时感知，它才能够在后来被征用为一种共识性的信号——指着同一个对象时喊出同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可以成为那个对象的“公共代表”。这埋下了“透明化”的种子：声音之所以能被用来指物，是因为它能被共享。但另一方面，这种共享本身也埋下了“不透明化”的种子：声音之所以能让人感到“在一起”，也是因为它能被共享。同一种“共享性”，同时孕育了让它消隐于所指（透明化）和让它凸显为所感（不透明化）的两种可能。在最初的咿呀游戏里，这两种可能是混而不分的：婴儿的声音，既是她自得其乐的身体游戏，也是她吸引成人注意、构建联结的社交工具。这两种运作方向在同一片声音的流水里并流，尚未发现自己将来会被劈成两股彼此对立的洪水。

因此，语言并非在一个纯粹的“美学天堂”里被“真”这个外来暴君所入侵和玷污。发生学的叙事拒绝这种失乐园的结构。正确的描述是：语言在进入符号指涉这道门槛之前，其原始的声音介质中，已经潜在地蕴含着使它后来既能被征用为指涉工具、又能被保留为身体共振材料的“共享性”这个双重基因。是符号指涉这件事本身的发生，把这种潜在的、静默的双重性，突然激活为一种显性的、永不停歇的撕扯。而语言的存续，正是从这道被劈开的伤口里，涌出了它此后一切自我更新的能量。

三、符号的发生：当同一个声音被劈成两半

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社会协作的复杂化，人类开始发现声音这个“内在玩具”的一项令人震惊的延伸功能：它可以充当“不在场者”的代表。一个特定的、经过重复而稳定下来的声音序列——比如某种类似“杯-子”的音节组合——不再仅仅是玩杯子时被偶然触发的伴随声响，它变成了一个便携的、可以被任何人主动调用以激活另一个人心中那个杯子概念的信号。当一个孩子意识到，即便母亲不在厨房、此刻根本看不见杯子，只要自己发出那个声音，母亲就能理解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时，一个革命性的认知飞跃便发生了。这就是符号指涉的正式登场：世界上的事物，从此可以通过声音被“搬运”、被“谈论”、被“计划”，而不再受制于直接的时空感知。我们可以谈论昨天见过的鹿群，也可以计划明天的狩猎。

这场飞跃的后果是深远的，但本文聚焦于它对语言内部那两种力量造成的后果：那个曾经混而不分的、自给自足的声音游戏，从这一刻开始，被强行劈裂成了两个方向相反、但又死死咬合在一起的运作模态。

第一个方向，我们称之为“透明化”。当声音被指派去代表一个不在场的东西时，它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最大限度地让自己被遗忘，以最清晰、最高效的方式将心智的目光引向它所指向的那个对象。听话的人不应该去回味“杯-子”这个声音的音色有多美、节律有多妙——他应该直接想到杯子。在这种模态下，声音的功能性以牺牲其自身物质存在的显著性为代价。符号系统必须开始建立强制性的区分网络——“杯”不能也同时指鳄鱼，除非在特定的组合规则中有清晰的消歧手段；“有毒”不能也同时指“可食用”。一套指向外部世界的规则网络开始生长起来，对同一个音在不同语境和组合下的指涉边界施以越来越严密的约束。这就是求真冲动的原初形态，但它并非一个带着事先规划好的“合一性、容纳性、建造性”蓝图闯入的成熟主体。更准确的发生学描述是：那些后来被我们总结为“逻辑要求”的规则，是在一次次具体的指涉失败的现场中被逼出来的。当一次错误的指认导致同伴采食了毒果，当一次模糊的方向指令导致狩猎队误入了猛兽领地——这些灾难就是最早的真值检验。它们不是某个先验理性在审阅语言系统后下达的改良指令，而是客观世界以生存代价的方式，对那些造成了致命后果的符号模式施加的负反馈压力。那些碰巧没有被淘汰、或者被修正后幸存下来的音义连接和组合规则，便逐渐被稳定为一种叫作“语法”的规范性骨架。它是在无数具体死亡的否决票之下，被反向筛选出来的残存者。



第二个方向，我们称之为“不透明化”。在同一个符号指涉的现场，即使透明化的压力已经无可逃避地降临，声音那原始的、不透明的物质质感并没有被消灭。它只是被压抑了，或者说，被转变了运作的层面。一个孩子学习“杯子”这个词，绝不仅仅是学习一个透明的符号。她是通过母亲用一种特定语调说出这个词时，与母亲之间建立的那种亲密的、浸透了情感温度的互动，才真正学会并愿意使用它的。那个音调本身——它的高低、它的缓急、它与当时环境声响的融合方式——传递着远超过“那个容器”这个指涉信息的厚度：它同时传递着母亲此刻的情绪、她对孩子的态度、乃至她们之间整个关系史所沉淀下来的身体记忆。在每一个具体的言语行为中，透明化的向量和不透明化的向量是同时活跃的。前者让话语指向外部对象，后者让话语指向说者与听者之间的互动场本身。

正是这两种同时活跃的向量之间的不可通约，构成了语言内部第一推动般的、无法消除的紧张。试想一个极端情况：当群体面临即时生命威胁时（比如暗中潜近的猛兽），透明化的压力会压倒一切——你必须用一个最短促、最清晰、最不会被误听为任何其他东西的声音来传递警告。那个声音必须被彻底消隐，以便让警告的内容几乎“绕过”听觉，直接引发身体的本能逃逸反应。美学上的考虑在这里是致命的奢侈。但在另一个极端——当一个社群在夜晚的篝火旁通过叙事来重温当天的恐惧和胜利时，不透明化的压力重新占据上风。讲述者会被要求用某种特定的腔调、某种富有节奏感的重复、某种故意渲染的沉默，来把那些实际上已经过去了的危险，在当下重新制造为一种可以被共享地体验、被共同消化的情感真实。在这时候，没有听众会去介意那个声音是否“最精确地”描述了猛兽的体貌特征——事实上，过于精确、过于冷静的描述反而会破坏那种共享的恐惧体验，从而削弱叙事的凝聚功能。他们需要的是声音本身的感染力。

这道劈开同一声音基质的裂缝，其根本的不可还原性正在于此：它不像“感性与理性”或“形式与内容”那样，预设了两个不同实体的相遇。这里只有一个物理过程——声音的发出与接收。但这个物理过程一旦进入符号运作，就同时沿着两个不可通约的方向在运作：一方面，它必须作为一个替身，去“指”那个不在场的东西（为此它最好是透明的）；另一方

面，它必须作为一件物，被两个人同时“感”到（为此它最好是有质感的、不透明的）。这两个方向不是语言的两个部件；它们是同一个媒介的两种基本运作模态。你不能把这一声音的“透明用法”（指涉）和“不透明用法”（共鸣）切开，因为它们在每一个具体的言语事件中都是共现的——只是一个被前景化，另一个被背景化。你改变前景与背景的配置，就会改变语言此刻的形态；但你不能消灭其中任何一个。把一个婴儿学语时母亲充满爱意的语调完全剥离干净，只留下“纯粹指涉”的声音，那将使那个孩子根本不愿意去学；反过来，把指涉的压力完全撤销，让声音只停留在无对象的共鸣游戏中，那将使这个社群无法谈论任何不在场的危险、任何明天的计划，从而在生存竞争中迅速被淘汰。

这就是本文核心命名的“不可还原性”之所在。它不能被“感性/理性”二分替代，因为语言的不透明化模态极富理性建构的成分——六音步格律的严谨、四字格的结构对称、曲折变化系统的首尾呼应，这些都是高度理性化的建构，不是本能的感性冲动。它也不能被“形式/内容”二分替代，因为语言的透明化模态也会产生自己特有的形式愉悦——一个逻辑完美的论证、一个推导严密的公式，在数学家眼里同样具有强烈的美学吸引力。它甚至也不能被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二分替代，因为能指和所指描述的是符号内部的二元结构，而本文所说的两种模态，是符号使用中两种相反的在时间中行进的方向：一个是“穿过”符号去抵达所指，一个是“停留”在能指本身。索绪尔的结构是静态的，本文的张力则是动态的事件。如果不理解这种在时间中发生的运作性区别，理论上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个符号能同时引发这两种如此不同、甚至相悖的心智行为——同一个声音序列，在一句科学报告里被感知为一组透明的信息代码，在一行诗里被感知为一段不透明的、必须反复吟味的旋律。正是语言的这种“既透明又可停留”的物质特性——这个被其他所有符号系统所不具备的特性——使得“真/美”张力不能被任何更高阶的概念所还原或收编。它直接落在语言之所以为语言的载体条件上。

在厘清了这道张力的独特性质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在语言长时段演化的过程中，这两种模态的撕扯究竟在哪个层面上留下了最深刻、最持久的痕迹？接下来的两节，我们将分别聚焦于两个最关键的战场：语法（第四节）和口头传统的跨代存续（第五节）。

四、语法：在透明化与不透明化的交汇处被塑形

在讨论前文所揭示的那种基本张力时，一个极易出现的误解是将语法简单地归类为“透明化”模态的纯粹产物——仿佛它仅仅是一套为了确保指涉精确性而自外强加于语言的、冷冰冰的逻辑枷锁。这种看法相当普遍，因为它与我们在标准教育中背诵语法规则、修改病句的痛苦经验相符。然而，这一理解的深度远远不够。如果语法仅仅是服从于指涉精确性的实用规则，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所有人类自然语言的语法，都展现出一种在效率和精密度上远超生存所需的复杂性？为什么最抽象的语法范畴——性与格、时与体、虚拟语气与祈愿语气——往往携带着即使在纯粹逻辑意义上也是冗余的形态标记？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一个“好”的句子，无论是在哪种语言里，给母语使用者带来的不仅仅是“懂了”的满足，还有一种类似“对了”的、带有强烈审美-身体性质的愉悦感？

本文的论点是：语法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透明化”模态的产物。它恰恰是“透明化”与“不透明化”这两股力量在漫长的语言使用史中，相互角力、相互塑形、相互妥协之后所凝固下来的战场地貌。语法的任何一处，都是两张压力在同一个结构上留下的复合印记。

要理解这一点，最有效的路径不是宏观的理论陈述，而是去追踪一个具体的语言结构从其美学原型、到功能重压、再到新形态新生的完整演化过程。汉语中的四字格提供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分析样本，让我们可以一镜到底地看到，两种模态是如何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结构里持续撕扯、不断重新结算的。

让我们从“山清水秀”、“风调雨顺”、“掩耳盗铃”这类经典四字格的美学原型开始。从纯粹的信息传递功能来看，四字格当然在传递意义——一个高度压缩的、往往携带着故事和道德教训的意义包裹。然而，四字格本身作为一种语法-修辞模因得以广泛存在并在数千年间被大量复制，其更根本的动力来自美学。它将一段复杂的、有时是散乱的语义内容，强行压缩进一个由四个音节构成的、由平仄规律和语法结构共同支撑的、极度稳定的节奏模子中。当这个模子被正确调用时，它会产生一种听感上的“完全性”——那是一颗浑圆的音义珠，多一字或少一字都会破坏其内在的节奏，仿佛它天生就长成了那个样子，从未经历过任何演化的挣扎。“掩耳盗铃”的并列式结构（动-宾 + 动-宾）和声调上的高低错落，让它在听感上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闭合体。这便是不透明化模态在语法层面的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它将一个可能松散的意义，固定为一个可被直接感知的、具有物质完整性的声音像块。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四字格并没有停留在纯粹的声音塑像上。它同样为透明化模态——尤其是语言不断需要容纳新经验、建造新逻辑的冲动——提供了一个极其高效的模板。任何后来者都可以根据这个“2+2”或并列或述补的韵律框架，往里面填入新的语义内容，不断制造出新的四字格，而无需每次都重新发明一套语法结构。从晚清以来大量从日语借入的“四字新词”（如“唯物主义”、“帝国主义”），到当代网络空间层出不穷的“人艰不拆”、“十动然拒”——这些新造的压缩格式一方面当然是在传递新的信息（透明化冲动：我们有新的社会经验需要被迅速命名），但另一方面，它们必须借用老四字格的韵律框架，并用某种高度凝练、有时是故意扭曲常规语法的方式（如“人艰不拆”是“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的暴力压缩），来制造一种新的形式趣味（不透明化冲动：这个梗很新、很妙，你一听就想用它）。在这场微型博弈中，旧的韵律模子被不被彻底打破，而是被作为新语义内容的“快递包装”加以征用和改造。透明化的压力（命名新现象）利用不透明化的遗产（旧节奏框架），共同生产出了一个新的语言个体。

然而，张力从来不会在这里永久休战。当现实世界的复杂程度远超四字格所能承载的精密性时，语言必须毫不留情地暂时搁置这个精美的珠子，转而采用散文化的、结构更松散、嵌套更复杂的长句，去推进思想在逻辑密林中的攀爬。在这一刻，原有的音乐性被牺牲了——长而复杂的嵌套从句注定无法契合“2+2”的节奏牢笼。“因为……所以……”的逻辑长链，对仗无法装下的修饰与限定，会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挤破那个原本完美的声音像块。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但对于求真的事业而言，却是一个必要的时刻。而更有趣的是，在长句散文化的潮流蔓延数代之后，往往又会有一场新的美学公投发生——人们会开始觉得“句子太散、太拗口”，于是某些被淘汰的结构被重新拾起，某些新的、能够处理更高层级逻辑复杂

性的韵律形态被逐渐摸索出来。这便是整个语法系统在局部结构的“结构化”与更高层级的“解结构化”之间的永续震荡。透明化与不透明化，在这方寸之间从未和解。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四字格这个具体个案移开，投向其他语言语法演化史上的宏大场面，便会发现同样的博弈逻辑在更大尺度上重演。拉丁语中极其复杂的名词变格和动词变位系统，便是一个极佳的参照。从纯粹信息传递效率的角度来看，这套系统中有相当一部分标记是冗余的——句中的介词、副词、甚至上下文本身，常常已经足够为时间关系和施受关系提供消歧。那么，为什么这种认知耗费如此之高的冗余结构会被长期维持？一个被传统语言学边缘化但却极具穿透力的解释是：曲折变化系统并非纯粹的逻辑枷锁，它同时是一套极其精妙的声音呼应系统。一个形容词的性、数、格，必须与它所修饰的名词保持严格一致，构成一种语法上的“黏合”；一个从句中的动词时态和语式，与主句动词遥相呼应，就像一组多米诺骨牌次第倾倒，首尾相连。当一句复杂的拉丁语句子被完整地说出时，那些词尾的变化在听者脑中制造出一种环环相扣的形式快感。语言形式本身，在此刻成为一种可供品味的美学结构。这便是不透明化模态与透明化模态达成的一笔威力巨大的协作：逻辑上的一部分冗余，被征用为美学上的形式华丽。

但同样的结构，在另一个时代则会受到完全相反的裁决。从拉丁语分化出来的现代罗曼语族诸语言，在不同程度上简化了古典时代的曲折变化。这不是因为某种神秘的“语言退化定律”，而可以理解为语言社群集体做出的一轮新的美学公投：原先那种高度繁琐的、要求说话者在开口之前就在脑子里把词尾变化全部预先算好的语法形态，被新一代语言使用者感受为一种不堪承受的认知重负，一种过时的形式主义包袱。他们用脚投票，在日常言说中逐渐放弃了那些形态标记，选择了新的、主要依靠词序和介词的分析性手段。这个选择可以被看作是透明化模态的一次重大推进：语言变得更轻便了，更易于即兴发挥，而释放出来的认知资源，使得更复杂的分析性句式——如严密的关系从句——得以发展，从而在新的高度重新支持更抽象的求真建构。但是请注意，这场简化并非不透明化模态的退场。在新的分析性语法成熟之后，语言社群并不会安于一套只剩下干巴巴词序规则的系统。我们很快就看到，那些被释放出来的认知资源和形式感，会被重新投注到新的美学领域中去——比如英语在失去大部分变格之后，发展出了极其复杂的音韵律（如十四行诗体的精妙节奏），以及通过介词和短语的巧妙排列来制造语言风格的繁复技艺。语法，就在这种“为美所累、为真所简、为更宏大的真所重建更抽象的美”的循环中，永不停歇地演化下去。

五、在文明的断裂带上：不透明模态的封装与救援

如果一种语言的生命力仅仅依靠其指涉世界的透明精神来维持，那么我们应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在文明剧烈断裂的时刻——战争、瘟疫、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或是另一种拥有更强大制度和书写体系的外来语言的殖民统治——那些在透明指涉层面最为发达的语言，应该最有可能存活下来。文字记录最精确的、法律和哲学典籍最丰厚的、科技术语最完备的语言，在遭遇劫难时，其存续的概率应该远远超过那些只有简朴歌谣和口耳故事的群体。然而，历史的实际图景恰恰与此相反。在无数次社会崩溃和文字断绝的危机中，维系一种语言不被遗忘、不被抛弃、最终能重新浮出历史水面的，往往不是那些伟大的法律典籍或哲学巨著，而

恰恰是那些看似柔弱的、最为“不透明”的口头传统形式：歌谣、谚语、格言、神话、摇篮曲、祭祀时的仪式性哀歌。

这些文类共享着一种独特的、对语言存续至关重要的结构特征：它们都是将透明真理（关于世界的深刻解释、关于伦理和历史的集体记忆）包裹在一层极厚的不透明外壳（那种能直接作用于身体和耳朵的、能制造记忆黏性和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韵律与声音体验）之中的微型胶囊。这种封装策略，在正常时期可能仅仅表现为某种民间的审美偏好，但在文明断裂的黑暗年代，它则上升为一种关乎生死存续的核心生存机制。

荷马史诗在“希腊黑暗时代”的口头传统，是一个被反复引用但其发生学意义常常被低估的壮丽例证。在迈锡尼文明的宫殿制度崩溃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线形文字B的彻底失传。整个希腊世界在此后长达三到四个世纪的时间里，退回到了没有书写的村落氏族社会。在这漫长的文明断裂带中，关于迈锡尼时代英雄荣光的记忆、关于荣誉与命运冲突的整套观念体系、以及一个泛希腊民族意识最原初的自我界定，究竟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它们并非依靠被埋入地下、等待考古学家日后挖掘的泥板文书。它们是被一代又一代不识字的游吟诗人，在篝火旁，在贵族的宴饮厅堂里，用一套固定在六音步长短格律中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吟唱出来的。

如果对这些叙事只是做纯粹的信息还原——把《伊利亚特》的核心情节概括为“一场因争夺女俘而引发的大英雄阿喀琉斯的愤怒，及其最终平息”——那么这套被剥离了韵律外壳的信息骨架，在传递到第二代时便可能被遗忘，或在口耳相传中被严重歪曲。真正让这套复杂的叙事稳稳穿越数个世纪黑暗的，是那股奔腾的六音步格律本身。它不是一具把信息搬运过河的渡船，它是承载并构成了这整个叙事世界的活水本身。格律就是那项不容被侵犯的美学律法。在每一次吟唱中，吟游诗人被这套格律所严格约束——特定位置的音长、特定行尾的停顿、特定常备修饰语的选位——但这种约束，并非仅仅是限制了即兴的自由；它更是一种顽固的记忆锚点。一段文字一旦被套入这个固定的节奏牢笼，它就不太容易被后来的复述者任意篡改，因为任何不合格律的篡改，在听感上会立刻“崩掉”，就像一个在合唱中唱错了音的人会瞬间被揪出来一样。同时，这套格律本身，也是整个情感经验的直接制造装置：它那奔流的长短短节奏是骏马的奔驰、是海浪永无止境的拍击、是英雄内心难以平息的愤怒的肉身化。听众们在格律的流中被直接浸没，他们所体验到的，不是一种对远古历史事件的冷静指涉，而是一种正在此处的、在身体内部重新发生的情感真实。这种共享的沉浸体验，让叙事本身变得不可抗拒。一个人听过一次，就会盼着听第二次；一个孩子长大后的某一天，会发现自己竟然能不知不觉地吟唱出童年听过的大段英雄诗行。

正是在这里，“不透明化身躯装载透明真理”的发生学逻辑，得到了最清晰的展现。那个被不断地、忠诚地重复的声音外壳，制造了群体性的身体共振和审美吸引力，确保了整套复杂叙事能够在一代又一代非识字者中被顽强地传递。而每一次传递，在确保了格律形式不变的同时，其内部所包裹的关于羞耻、关于荣誉、关于人与神之间那脆弱的界限感这些深刻而沉重的旧日真理，也就这样被悄无声息地、却又无法抗拒地，重新灌注进了新一代希腊人的心智土壤之中。这套感官上容易记住、但逻辑上不容易被歪曲的形式美学，保证了那个庞大

的、关于民族之根的真理性叙事，被整个民族背在自己身上，走到了文明的黎明重新降临的那一刻。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也不是一个仅仅属于遥远过去的现象。在现代加利西亚语被西班牙语严重压制、几乎沦为农民厨房语言的低谷时期，让它封存着一点火种的，正是那些被妇女们一代代在劳作和育儿中低声吟唱的、充满韵律弹性的乡村歌谣，而不是高等学院里用干净但标准化的西班牙语所撰写的语文学专著。在当代威尔士语复兴运动中，最关键的社会机制之一，就是遍布城乡的、充满强烈身体和声音共振的业余合唱团——成百上千的普通人聚集在一起，用和声去反复地、充满仪式感地触摸那些几百年前被谱写出来的威尔士语圣歌。在那样的和声场中，语言首先不是一套用来陈述外部事实的符号系统，而是一种让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声波共鸣得以发生的、有厚度的物理介质。正是这种难以被政治暴力或社会歧视所彻底根除的、根植于身体快感和群体归属感的“不透明化”体验，为语言保留了即使在透明化领域被完全剥夺了公共展示权之后，仍然能够在一个社群体内继续呼吸下去的毛细血管网络。

然而，如果不透明化的力量在危机时刻果断出手、独自支撑起了语言的跨代传递，它自身也携带一种致命的诱惑：将自己冻结。当一个语言社群将某个特定时期的韵律形态和叙事范式奉为不容更改的圣典，以保全其作为认同象征的纯粹性时，那种曾经让语言在危机中存活的“不透明化”之力，就会反向操作，从保护壳变成冷冻柜。宗教经文的神圣语言是这种冻结风险的极致体现。《古兰经》在阿拉伯语世界、或《梨俱吠陀》在古印度的存续史，都是“真-美”联盟达到极度紧固状态的案例。一套定义明确的诵经法（涉及声调、节律、呼吸、发音部位的极端精确化）被建立起来，与被它包裹的神圣真理相互捆绑：一个字、一个变格、一种声调的错误，都被视为对真理本身的不可饶恕的背离。这种几乎坚不可摧的封装，确实赋予它们穿越数千年的惊人免疫力——一种木乃伊式的不朽。但它的代价同样惨重：这种为了绝对安全而执行的自我冻结，切断了语言在日常生活中被即兴使用、被游戏、被误用、以及在过程中不断自我迭代的生机。一种被冻在绝对不透明外壳里的语言，虽然在仪式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却已无法自发生成新的俚语、新的玩笑、新的诗学实验。它活着，但不会呼吸。这恰恰从反面再次暴力印证了本文的核心判断：在一种张力的停摆中，无论是哪一种模态取得了绝对霸权，语言真正的生命体征——那种使其能够继续自我更新、自我适应、并在新的世界重新找到使用者爱它的理由的能力——都将无可挽回地熄灭。张力，而非任何单极，才是呼吸的源头。

六、结论：在永不停歇的撕扯中呼吸

回到开篇那个看似唐突的论断，现在可以给它一个更严格的学术复述了。语言的生命力，不源于它作为认知工具在某一刻所达到的完善高度，也不源自它作为声音游戏在某一刻所展现的原初诗意。它源于这两种无法相容的运作模态——致力于消隐自身以指涉世界的“透明化”，与致力于凸显自身以共鸣身体的“不透明化”——在同一种声音基质上被生命劈开后，所卷入的永恒且不可撤销的相互撕扯。这道裂痕从未合拢，也不应该合拢。语言在历史长河中的每一次重大存续危机，都恰恰是其内部这两种力量之间的角力被某种外部压力所压扁或冻结的时刻；而每一次能够穿越断裂带的顽强存活，也都恰恰在于那道裂缝仍未被焊死，仍有新的声音在裂口处被逼迫出来。

理解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语言危机与活力的新研判坐标。一种语言的真正危险，并不首先表现在其使用人数的下降或语法规则的崩解上。更根部的诊断点在于：它内部这两种模态之间的角力是否还在有效运作？是否还有人在为如何把当下的鲜活经验强塞进那些古老的韵律模子里而烦恼，并因此挤出新的形式？是否还有人在为如何用这门外表陈旧的语言去讨论最新的科学发现并将其说得有风格、有光泽而缠斗不休？一旦一个语言社群完全丧失了让这两种冲撞持续下去的意愿和动力——一旦它的诗歌退化为没有任何人真心想唱的纪念品，一旦它的日常言说里再也听不到任何野生俚语和天外飞仙般的修辞错误——那么，那个语言的呼吸，便已在深层意义上趋近于平息。即便它仍然作为一门教学科目存在于课表上，作为一种行政语言出现在公文中，它在精神上也正在走向它最后的博物馆陈列。我们至今仍然在说话，并非因为我们已经抵达了某种完美的沟通状态，而是因为我们至今仍然在为同一件事而持续挣扎：如何让这同一种转瞬即逝的声波，既能稳稳地咬住这个坚硬冷酷的外部世界，又能深情地触动那个渴望与另一个肉身共鸣的内在。这是语言诞生之初便被种下的、无可逃避的矛盾。而我们仍在说话的事实本身，就是这场挣扎仍在继续的唯一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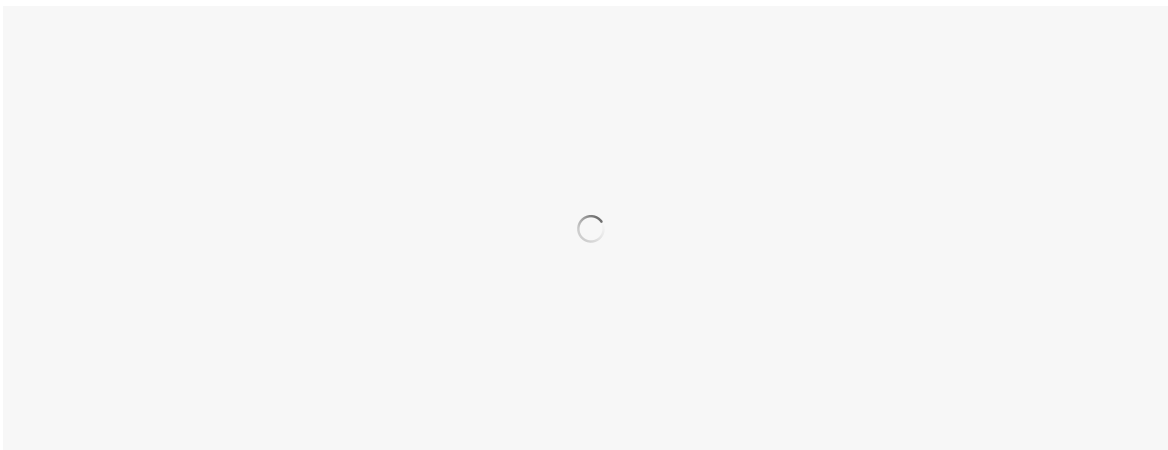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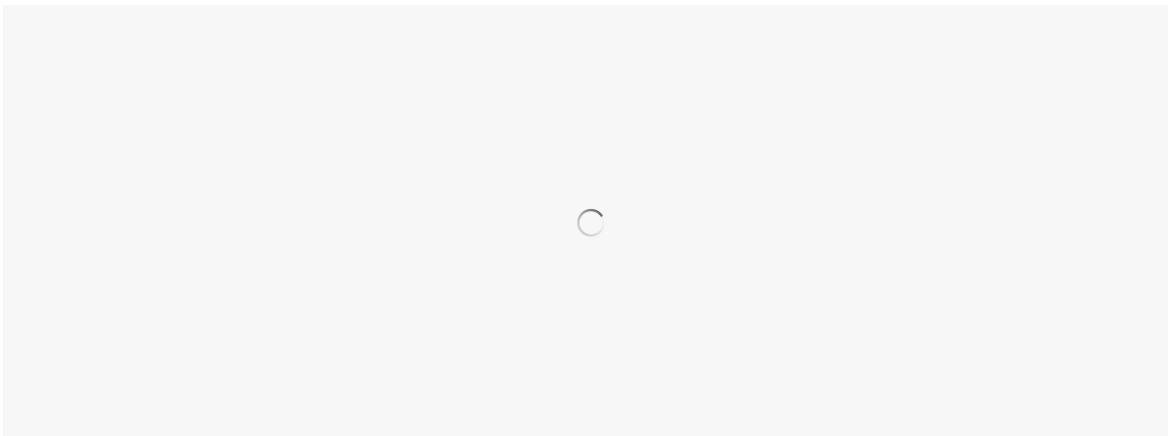
本文的论点，因此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形式的“回归”叙事。没有一首可以回到的、完整的原初之歌。那首“歌”——如果可以称之为歌的话——本身就是分裂的。在声音共享性那浑然未分的母胎中，已经蕴含了日后必将撕扯开的全部潜能。任何企图把语言重新还原为任何一种纯粹单一状态——无论是哲学家的纯粹逻辑符号系统，还是浪漫派想象中的纯粹声音肉身——的努力，都不仅仅是在实践上注定失败的实验，更是在理解上错过了一个根本的真相：语言的存续，恰恰是在承认并持续处理这场无法调和的撕扯中，才获得了它唯一的、真正的动力装置。这也许就是我们与语言关系的最终隐喻：我们不是这首歌的演唱者，而是它永远的修改者。只要还有新一稿的修改在进行中，语言就仍然活着。



证伪条件： 若未来的实证研究能够确认，存在一个在代际间自然传承数百年以上的人类语言社群，其日常语言系统中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基于对声音本身的物质性玩味而自发产生的形式偏好——没有隐喻的凝固与更新、没有对特定节奏模式的集体倚重、没有任何无法被信

息效率量化的修辞操作——并且其使用者对这套纯粹工具性的语言系统感到长期的、完全的满足，从未自发地制造出任何偏离其纯粹工具用途的语言变体，那么本文关于这两种不可通约的运作模态之永恒张力构成语言存续根本动力的核心论点，就将被从根本上证伪。

约翰老师简介：



约翰老师与导师合著的专著：



约翰老师导师王德生博士介绍：

📖 [从发现到发生：王德生博士的学术贡献与著作序列](#)

往期好文：

📖 [长途大巴突然翻红：不是时代倒退，而是普通人的钱包在重新投票](#)

📖 [日本美学的真相：不是温柔，而是学会与消逝相处——从物哀、幽玄、侘寂，看一种文明如何把无常变成美](#)

📖 好的语法教学，不是消灭错误，而是让孩子拥有组织复杂意义的自由

📖 英语高级词汇的秘密：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撑起了半个学术英语世界